

初識陳香梅

20世紀80年代的上海正面臨城市功能定位從全國工業中心城市，向全國工商業中心城市轉型；經濟運行態勢已從產品非市場化與要素非市場化的均衡狀態，走向了產品市場化與要素非市場化的失衡狀態，正邁向產品市場化與要素市場化的再均衡狀態。其間，每一階段的轉變都牽動着一系列的制度重新安排，也必然關係到各個環節及相關群體的利益重新分配。上海市政府在破冰前所未見的制度重建外，還要在僅有區區200平方公里左右的建成區裏，承接起負有全國“一盤棋”經濟使命的高密度產出。無論從規模還是質量土判斷，當時的上海市中心遠遠不及現在我國的三線城市，整體的城市風光，與當今的朝鮮相去無幾。

從外部世界初來乍到上海的人，都會不同程度地感受到這個時代的烙印：一是產出高密度和產出低層次導致城市臟、亂、差的死角隨處可見。二是產出的低附加價值和社會的低分配率，導致中心城區呈現一派祇求溫飽的消費風景綫，馬路上幾無私家車。三是為求小康生活，提高社會資源配置效率，全市每個角落都在悄然進行勞動和分配體制改革的探索。

值此社會大背景下，20世紀80年代初夏的一天，我代表上海交大黨委書記鄧旭初，有幸與復旦大學蘇步青校長，同濟大學李國豪校長，上海市科協劉吉副主席一起，在上海《錦江飯店》陪同陳香梅女士共進晚飯，並暢話上海這座30年代亞洲第一都市的今昔。市政府之所以作這次歷史性的安排，其考量顯然有二：

一是陳香梅女士是位熱心祖國教育事業的使者。她的理念是：“有好校長就有好教師，有好教師就有好學生，有好學生就有好公民，有好公民就有好社會，有好社會就有好國家，有好國家就有和諧幸福生活。”因此，早在1984年，陳香梅已經開始在中國大陸設立專項教育基金，支持在艱苦條件下堅持辦學的教師和優秀學生。經她多方奔走籌集資金，設立了“陳香梅優秀校長獎”、“陳香梅教育基金優秀教師獎”，共獎勵支持了670餘位在邊緣貧困地區工作的我國一綫鄉村教師。在此基礎上，安排上海幾所名聲顯赫的名校與之會見，旨在希冀陳香梅女士用國際視野，對祖國發達地區高等教育的開放

舉措有所關注。

二是陳香梅女士是美國各界了解中國的“一扇窗”。在時年中美戰略關係的格局中，兩岸關係至關重要，而兩岸關係正是她心迹之所系。在兩岸關係史上，是她最早向臺灣蔣經國先生提出開放兩岸探親，僅在短短幾個月內，就促成並通過了臺灣居民赴大陸探親的《規定》。1989年初，她又親自組織臺灣工商界人士赴大陸考察，這在西方國家準備對中國實施經濟制裁之際，她毅然率領的一個龐大的《臺灣工商界投資考察團》抵京考察，無疑震驚了世界！

在我們相見時，出身于戰地記者的陳香梅，以其特有的職業眼光窮根刨底，足見其對事物觀察的洞察力和對祖母社會進步的熱情度。她十分健談，一口標準國語，對於上海的未來充滿興趣，從城市管理到科技教育，幾乎不停地插話詢問。給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，陳香梅女士熱愛祖國，偏愛上海！

當時，上海交大成功改革的消息早已曉諭大洋彼岸。她言談中的發問告訴我，對祖國教育事業傾注過心力的陳香梅女士，此行胸懷宏志而有備而來。我坦率地告訴陳香梅女士，上海交大改革的初衷是鄧旭初書記的兩個觀點：一是物力資本的開發是以人力資開發為前提的，教育是生產力之母，祖國落後的根本原因不在物力開發，而在人力開發。二是我國教育效率之所以低下，源自於學校傳統管理體制的僵化，它束縛了潛藏於高校內部的生產力，因此，祖國要復興路在教育，行在改革，這是歷史進程的不二選擇。交大改革為全國走出路子，與其說是一種前瞻性的“先覺”，不如說是上海交大特殊校情的“倒逼”。

事實上，時年的上海交大祇是名聲在外，浪擲虛名而已。因為，它先後歷經五次重大變故而深受其傷，且其受傷程度是全國高校所鮮見的。陳香梅女士聽到此，眉宇上揚眼神專注。我接着向她介紹了五次變故對上海交大實力的釜底抽薪。它們分別是：一，具有個性化的第一次歷史性變故發生在1949年，時任交大校長郭南宏博士率校離滬東渡，落戶臺灣新竹，上海交大的損失無可估量。二，具有共性的第一次事件是1952年的全國院系調整，將上海交大理科和管理學科全數肢解給兄弟院校，此時的上海交大元氣大挫；三，具



圖一，陳香梅女士，圖源：百度。

有個性化的再一次事件是在1957年，中央政府決定上海交大西遷，後經協商將學校欄腰分截，重點學科和中青年骨幹師資幾乎悉數西遷，以致上海交大祇保留一所造船學院的架構。四，又一次具有個性化的事件是1962年上海交大劃歸“國防院校”體制後，學校開始按家庭出身劃分師生保密等級，致使大批低級高師資星散各方；五，再一次共性的事件是1966年的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對已所剩不多的優秀教師冠以“白專”和“反動權威”而被迫逐出講堂直至告老。

換言之，“文革”結束之後的上海交大已面目全非，內傷累累，外強中幹。因此，在改革的起跑綫上，任何一所著名的重點高校都有條件左顧右盼緩跑片刻，唯獨是遍體暗傷的上海交大沒有這個資格可以不按發令槍聲拔腿。我按鄧旭初書記的話戲說，這叫做“傷鳥

先飛”。陳香梅女士和在場的同行聽後，無不心領。

鄧小平先生曾對陳香梅女士向美國參議員史蒂文斯作過評說：“美國參、眾議員有數百，但陳香梅祇有一位，全世界也祇有一個她！她是女人中的女人，活着的傳奇！”有回憶文章對其點評更是入木三分：“她是一個如梅般的女人，既有梅的香氣也有梅的傲骨。”

作為一名抗日烽火中的戰地記者，她見證了一代飛虎傳奇；成為走上美國政壇的第一位華裔女性，位列全美70位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，曾被美國8位總統委以重任。這位出生于1925年6月23日北平的名門之後，父親陳應榮是牛津大學的法學博士和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博士，但結婚時身穿的却是選擇上海“綠屋夫人”所制的婚紗，丈夫陳納德將軍則是身着戎裝。

婚紗的選擇折射陳香梅女士與上海之緣，借此文結尾我托釋迦牟尼佛的吉言：“你遇到的每一個人和每一件事，都是緣份。”我此生已無緣感謝陳香梅女士的一件軼事：是她悉心幫助過我在美工作的學生倪濤博士，在他創辦的美國首家簡體字中文報——《新世界時報》（1997年創辦）長期擔任報社顧問並給予指點迷津，旨在宏揚她長駐心扉的中國文化。冥冥之中，這是陳香梅女士對我們十多年前上海初見交談的一種回應，因為，她給予關愛的倪濤博士當年正是上海交大的本科畢業生。而陳香梅女士直至仙逝也不曾知曉，她支持過的這位年輕華人正是我的學生。

陳香梅女士的古道熱腸充分體現在她在美國白宮“穿旗袍講中文”時的一句名言：祇要中國人能揚眉吐氣，我心願已足。（文/朱榮林）



圖二，國家領導人會見陳香梅女士一行。圖源：“老年雲課堂”。



圖三，我在美學生倪濤博士為陳香梅女士做88歲壽誕時的情景。圖源：倪濤。